

陈霞著

道教劝善书研究

儒道释
博士论文丛书



巴蜀书社

陈霞著

道教劝善书研究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巴蜀书社

责任编辑:黄小石

封面设计:张光明

道教劝善书研究

陈霞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成都神仙树南郊村工业小区(028)5183822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70 千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220 册

ISBN 7-80523-981-9/B·108

定价:1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导 言

一、劝善书概说

早在先秦、汉代就有《孝经》、《女戒》等具有劝善性质的伦理道德教化书。但作为一种特殊的、自成一家的道德教化作品——“劝善书”（简称“善书”）却正式形成于宋代，以《太上感应篇》的出现为标志。宋代就出现了特指教化性书籍“善书”这一专用名词。南宋大臣、学者真德秀的《西山文集》就提到了“善书”。他说：“《感应篇》者，道家儆世书也。蜀士李昌龄注释。其义出入三教中，凡数万言。余连蹇仕途，志弗克遂，故常喜刊善书以施人。”^①在封建社会后期，劝善书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和普及，明代出现了“劝善书”这一专门名词。明代成祖仁孝皇后徐氏“尝采女宪、女戒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佳言善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②《中国丛书综录》有教化书籍“善书”这个分类。

^① 《西山文集》卷二七《感应篇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 《明史·后妃传》。

自劝善书在宋代产生以来,上至帝王妃嫔、达官显宦、文人士,下至乡绅、民间艺人和黎民百姓都参与了善书的制作、推广、阅读、讲唱和欣赏。在儒、释、道三教以及明清时代的诸多民间宗教里均产生了大量的劝善书籍。除《太上感应篇》外,宋代出现的其他善书还有黄光大的《积善录》、李元纲的《厚德录》、陈录的《善诱文》、李昌龄的《乐善录》、真德秀的《谕俗文》和《四库全书》收录的《琴堂谕俗编》等,元代吴亮的《忍书》和冯梦周的《续积善录》等。明清比较有影响的善书有明代的《迪吉录》、《劝戒全书》、《了凡四训》等,清代前期的《愿体集》、《欲海回狂》、《不费钱功德例》、《身世准绳》、《远色编》、《信心应验录》等和清代后期的《训俗遗规》、《人生必读书》、《几希录》以及各种形式的功过格等。直到民国时期还有许多善书被重新翻刻出来。^①我们把各家各派的劝人行善积德通俗道德伦理教科书统称为劝善书。

“劝善书”是以因果报应的说教宣传伦理道德、劝人从善去恶的通俗教化书籍,简称“善书”,民间也将这类书籍称为“劝世文”或“因果书”。劝善书既指宗教性的道德劝化书籍,如道、佛的劝人行善之书《太上感应篇》、《自知录》;也指非宗教性的训俗小册子,如袁黄所著的《了凡四训》、《迪吉录》;劝善书还包括政府为老百姓制定的规章如“圣谕”之类,如明太祖的《修身大诰》、清康熙的《圣谕十六条》、雍正的《圣谕广训》;也包括民间用于讲唱的鼓励人们积善积德的曲艺唱本,如《济春台》、《珍珠塔》、《巧姻缘》等。《中国曲艺音乐集成》里很多地方卷都

^① 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列有“善书”这个曲种。总的来看，劝善书属于通俗道德教材，易晓、易懂、易行，传播的范围十分广泛，通都大邑、穷乡僻壤都有它的影子。它宣扬“善恶到头终有报”，且宣扬的力度很大、方法颇众、范围很广。社会各阶层制作的劝善书籍一般都放置在宫观寺庙、科场之外免费赠送或在集散贸易之地、街头巷尾、庭院坝子免费为人讲唱。由于参与善书制作、流通、宣讲的人数如此之多，继善书之后相继出现了善人、善士、善坛、善会，所以有学者如酒井忠夫、包筠雅将这场几乎全民参与的劝善潮流称为“善书运动”。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善书才在大陆渐趋消亡。时至今日，内地的佛教寺庙、道教宫观仍免费赠送印有“非卖品”的善书，也依稀可见为数不多的老艺人在道教宫观附近说唱善书。台湾、香港地区各坛庙仍在大量制作善书，在寺庙、车站、医院或街角等人们常去的地方，随时可看到免费让人取阅的善书。

在封建社会后期这场声势浩大的“善书运动”中，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适应社会的需要，率先投身到制作道德劝化书籍的行列中。宋代面世的《太上感应篇》既是第一部劝善书，也是第一部道教劝善书。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教首开了善书制作的先河，其意义非同一般。宋元以降，历代都有许多道教善书问世，在明清时期道教善书的制作达到高峰，广泛流传于社会各阶层，其影响延续至民国。道教劝善书在中国社会存在近千年，它的出现是道教逐渐世俗化、逐渐与民众生活结合的产物。“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道教劝善书的内涵精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形形色色的劝善书中，道教劝善书独树一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道教劝善书简称道教善书，毫无疑问是属于传统善书的范

畴，它具有广义劝善书的通俗性，也讲善恶报应，但它同时与道教本身的发展变化、道教的教理教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既有着一般劝善书的共性，又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尤其是独特的劝善方式、角度及内容。它是劝善书这个分类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对封建社会起了不容忽视的社会规范和伦理教化作用。

二、善书研究回顾

1. 国外善书研究简介

善书在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广泛流行，引起了外国学者们的注意。在中国善书研究方面影响较大的国外学者，当首推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酒井忠夫先生。昭和 35 年（1960）他就出版了专著《中国善书研究》。该书立足明代的社会现实，从明代的教化政策、明代乡绅及士人的处境、明代的三教合一思想及明代的民间宗教等方面对善书作了历史性的探讨。同时对《太上感应篇》、《功过格》、《阴骘文》和《了凡四训》等善书作了专门研究。这本书可说是善书研究的经典之作。酒井先生还发表有多篇研究善书的文章。酒井忠夫先生之前，日本汉学界还有橘朴的《支那思想研究》提到了善书，他认为善书是民间化道教的经典。龙泽俊亮的《满洲的街村信仰》也有一节研究善书。在日本的其他学者如泽田瑞穗有《宝卷的研究》，吉冈义丰有《功过格思想的源流》等文章。秋月观映、平野义太郎、清水泰次等学者也发表有许多关于善书研究的文章。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包筠雅 (Cynthia J. Brokaw) 所著的《功过格：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变迁与道德秩序》(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1 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明清的社会分层出发，研究了社会各阶层所制作的功过格的功能。包筠雅认为：一些社会下层的士人希望通过积善累德来获得爵位和子嗣，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中上层士人则希望他们的功过格能维持社会等级，各人都安分守己。各社团所制之功过格都表达了他们的社会理想。沃夫拉姆 (Wolfram Eberhard) 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罪恶观》(1967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专门就善书中的罪恶问题进行研究，并引进了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作者从描写地狱的善书中找出哪些行为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从而深入地探讨了中国人的罪恶观念。特利·克里曼先生 (Terry Kleeman) 1988 年撰《文昌帝君——一个中国民族神的诞生》，探讨了许多道教善书托其名的“文昌”如何由自然神向战神演变以及最后转变为伦理神的背景和过程。罗伯特先生 (Robert L. Chard) 的《灶君的仪式和经书》探讨了善书中的司命神——灶君的功能和人们对他的祭祀仪式。维克多·H 迈尔 (Victor H. Mair) 的《圣谕语言的思想特色》一文详细讨论了“圣谕”的不同版本及其印行、传播的情况以及圣谕的语言和思想特色。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亚洲学系的柯若朴博士 (Philip Clart) 1996 年完成博士论文《善书的仪式：台湾扶乩的个案研究》。这篇论文考察了台湾明正堂新出善书的过程、经本及善书的完成对于明正堂的意义，作者主要研究中国宗教信仰中经书撰作所产生的意义、作用以及扶乩善书的整个过程。柯若朴先生还有其他研

究善书的文章问世。这只是笔者了解的国外研究善书的部分情况。

2. 国内善书研究简介

台湾地区最先涉猎善书研究的学者是台大的蔡懋堂教授。他将酒井先生的《中国善书研究》一书的绪言、第一至第三章和第七章以及泽田瑞穗的《地狱变》译成汉语,并着手收集整理了100多本善书。1975年他写了《台湾现行的善书——献给善书印赠人及慨赠善书者》,1976年发表《台湾现行的善书》。台湾文献会的郑喜夫先生1981年发表了《从善书见地谈白衣神咒在台湾》,1982年发表《清代台湾善书初探》,对善书作了最广义、广义和狭义三个层次的区分。1988年郑志明先生出版《中国善书与宗教》一书,探求大传统的文化如何经过调适性转化,成为小传统民众的生活原理与价值体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朱瑞玲先生曾经从《太上感应篇》、《阴骘文》、《功过格》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几部善书来分析中国人的慈善观念、善书的传播策略,1992年发表有《台湾民间善书的心理意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的陈兆南先生以清代台湾善书的宣讲活动为研究题目作了博士论文《清代宣讲及其形式》。1992年张之清先生有《善书与医疗卫生》一文研究附在善书后面的民间验方,指出善书是基层社会医学的传播媒体。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宋光宇先生在1994年发表《解读清末在台湾撰作的善书〈觉悟选新〉》一文,研究了澎湖地方士绅如

何用扶乩的办法撰作善书。^①同年宋先生发表《清代台湾的善书与善堂》。

大陆虽然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对善书的研究。在《沫若自传》中，郭沫若先生回忆到：“我们乡下每有讲‘圣谕’的先生来讲些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大抵都是民间的传说。叙述的体裁是说白和唱口合成，很像弹词，但又不十分像弹词。这些东西假如有人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和修饰，或者可以产生些现成的民间文学吧。”^②但至今对此类通俗道德书籍的整理和研究都很不够，仅有早期的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和胡世莹先生在《弹词宝卷书目》中收集整理过民间说唱性的宝卷，其中包括善书。李世瑜先生在《宝卷综录》里收集过民间宗教的善书。陈垣先生曾发表《记许缙曾辑刻〈感应篇图说〉》一文，考订了从清初到乾隆年间的《感应篇》版本。近年来有1983年朱越利先生发表《〈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一文。本为对《太上感应篇》的成书年代作了考证，并分析了该书的内容、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及其流传和影响。作者认为该书的产生标志着北宋末道教改革的开始，以宗教世俗化为特点。1985年卿希泰先生和李刚先生发表《试论道教劝善书》，本文兼及《阴骘文》和《功过格》，对劝善书的思想来源、产生背景及其主要思想内容和社会影响作了分析。李刚先生还有《〈文昌帝君阴骘文〉试析》、《〈太上感应篇〉初探》、《道教功过格解析》等文章研究道教善书。刘守华教授在《口头文学与民间文

① 宋光宇《关于善书的研究及其展望》，《新史学》五卷四期，1994年12月。

② 《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

化》一书中有“论善书”一文，介绍民间说唱善书。蒋守文先生发表《四川善书（圣谕）源流辨——兼与何远志同志商榷》、《从善书的衰亡吸取教训》和《四川善书与川剧》等文章整理了明清以来在四川地区流传的曲艺善书，研究了四川善书的曲目、声腔内容。1995年袁啸波先生整理出版《民间劝善书》，民间有代表性的善书基本收入此书，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民间伦理道德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梁治平先生有《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讨论民间宗教与法律的关系，涉及了民间宗教的善恶报应思想和功过格。他认为“格”实际上是一个法律概念。功过格是一种阴律，是阴间的惩罚，在其流行期间起了很大的社会控制作用。香港中文大学游子安先生发表有《关帝善书》和《论清代江苏长州彭氏家学、善书与善举》及《明末清初功过格的盛行及善书所反映的江南社会》等文章，对明清时期善书在江南商业发达地区的情况作了研究。1999年出版《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对善书进行了界定，深入探讨了清代善书的发展与流行，并对清代影响较大的善书及其作者进行了个案研究，指出了善书的流通及其意义。书中还对同时期的基督教宣教小册子和善书进行了比较。

相比之下，大陆对劝善书的整理和研究与台湾地区 and 国外差距很大，对道教善书的研究就更薄弱了。由于道教善书主要流行在大陆，这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

三、道教劝善书的界定及特点

劝善书正式形成于宋代，其标志就是《太上感应篇》的出

现。自从《太上感应篇》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便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并不断有新的善书被制作出来，善书的阵容日益庞大，成为封建社会后期一股特殊的道德教育力量。道教劝善书也存在于这个庞大的善书阵容之中。

1、道教劝善书界说

道教劝善书简称道教善书，指假托神仙的名义制作或道教徒以个人名义撰著的、用道教教义、从道教神学的角度劝人去恶从善以成仙了道和积善获福的通俗道德教化书。道教善书包括说理性、操作性、纪事性和惩恶性四种类型。说理性的道教善书如《感应篇》、《阴骘文》之类，是从宗教神学的角度阐发的道德原则、规范和善恶条款。操作性的道教善书即各种名目的功过格，如《太微仙君功过格》，是实施说理性善书提出的道德规范的善恶记录簿。纪事性道教善书讲善恶报应的灵验故事，如《梓潼帝君化书》、《指淫断色篇》和《除欲究本》等。惩恶性道教善书主要指描写地狱情形的善书，如道士入冥而作的《玉历钞传》。道教善书既有劝善的方面，也有惩恶的部分。劝善和惩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劝善部分告诉世人行善会得到种种好报，惩恶部分提醒人们作恶会受到地狱的百般煎熬。即使惩恶部分也是为了劝人行善，警醒作恶多端的人早早向善去恶以免不测。道教善书既给人们讲善恶的道理，也为人们提供具体的行善措施；它既有着百姓易于理解和接受的生动的善恶报应故事，也有着足以让人胆颤心惊的对恶人的严惩不怠。道教善书采用多种方式、从多种角度来实现其劝善惩恶的伦理教化功能。它从善恶报应的角度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道教神学出发告诫世人，监察世人善恶行

为和念头的神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神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从而让人因敬畏神而不敢胡作非为。道教善书出现在上层道教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时候，至今已有将近千年的历史。它的出现是道教适应社会变化、通过自身调节进一步影响社会的表现，是道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产物。这种变化使得道教的伦理色彩更加突出，并促使道教本身从神学宗教向道德宗教转变，使道德教化功能得到加强和突出的道教重新获得了封建统治者的支持。

道教劝善书的伦理学说萌芽于汉代的道书，如《太平经》中的“承负”思想，魏晋《抱朴子内篇》等道书中的欲成仙当行善立功、克忠尽孝的思想等。这些思想乃是后世道教劝善成仙理论的思想渊源。第一部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感应篇》）成于北宋，宋代还出现另一本道教善书《玉历钞传》，在金元时期出现了《省心录》、《太微仙君功过格》和《文昌帝君阴骘文》（《阴骘文》）等对后代影响很大的道教劝善书。明清之际道教劝善书进一步繁荣。这期间有影响的道教劝善书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觉世经》）、《文帝孝经》、《文昌应化元皇大道真君说注生延嗣妙应真经》、《关帝忠孝忠义经》、《敬灶全书》、《指淫断色篇》、《除欲究本》、《寿世慈航》和《白话劝戒录》等。《道藏》还有汇编《太上感应篇》、《梓潼帝君戒士子文》、《阴德延寿论》、《放生文》、《杀生七戒》和《劝杀牛歌》^①等劝世文而成的道教善书集子《水镜录》。各种形式的“功过格”也被大量印造，如《十戒功过格》、《警世功过格》、《石音夫功过格》、《文昌帝君功过格》、《文昌帝君惜字功罪录》等。这期间解说《太上感应篇》、

^① “劝”在此处指“劝止”。

《文昌帝君阴骘文》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注书也不一而足。道教善书在从产生到繁荣的道路上不断与民间社会结合，世俗化程度不断提高。道教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的力度和广度得到加大。

2. 道教善书的特点

与其他善书相比，道教劝善书具有以下特点：

神灵的观念贯穿整个道教劝善学说。

道教善书作为一种宗教的伦理教化书，其神学观点一直贯穿在其劝善学说当中。首先，道教善书一般都假托道教神仙的名义来制作。道教徒十分仰慕神仙，把成为神仙作为最高追求。他们把道教经籍说成是神仙降授的，以增强其经典的神圣性。道教善书也体现了道教神化其经书的特点。道教崇奉的神仙们一般都具有完美的品德。借神仙的名义制作和推行善书，为了彰神明之德，以鼓励后人，让人们感受到神明的存在和力量，受到神仙的感化。那些位列仙班的神仙尽管自己逍遥自在，却非常关心下界百姓的世俗生活，他们有着博大的济世情怀。每当社会风气败坏、世风日下的时候，他们便会出来济世，点化时人。道教善书就是他们济世救人的一种方式。

道教劝善书主张神是道德的创造者、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道德行为的楷模，这是典型的“道德神启说”。神通过善书把善恶标准降给世人，为人立下道德法则。道教善书一般都是以“太上曰”或“帝君曰”开头。如《感应篇》开篇即说：“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阴骘文》开始讲：“帝君曰：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于是训于人曰……”关圣

帝君曾说：“见人心风俗日就颓靡，吾悯世之心隐然勃发。故奉玉旨降《太微仙君功过格》，增而行世以化顽愚。”^①神要么通过梦、要么通过扶乩或神游等神秘方式把善恶准则降给世人。如《太微仙君功过格》的制作就是神在梦中的提醒。作者说：

余于大定辛卯之岁仲春二日正之时，梦游紫府，朝太微仙君，得受功过之格，令传信心之士。忽然梦觉，遂思功过条目，历历明了。寻乃披衣正坐，默而思之，知是高仙降灵，不敢疏慢。遂整衣戴冠，涤砚挥笔，走笔书之，不时而就，皆出于无思，非干于用意。^②

这本善书虽出于人手，但作者是在梦中受到启发之后完成的。神还通过扶乩把神灵附在乩手身上，从而把上界的规定传达给世人，如鸾书《天津纲纪》即是玉皇大帝降鸾的善书。玉帝还亲自为它作序说：

玄穹高上帝玉皇大天尊旨曰：朕以世界生灵，各有性天，性天之得，得之苍穹。凡昧性天，是为伤苍穹。伤苍穹，理昧良亏，难还苍穹。只得灵沉地界，罚报惨途。还苍穹，理无他。时时明心地以处世，灵自不昧。灵不昧，获何果。朕差遣司律，稽查世人，查善恶以定因缘，稽功过以定赏罚。职掌天律，掌查稽责。灵不染、性得定。合苍穹而同寿，岂不快欤。朕不忍世人日日昧性，刻刻黑良，特准广善堂垂续天津纲目，以救世

① 《劝世归真》，《藏外道书》第28册，第21页，巴蜀书社，1993年。

② 《道藏》第三册，第449页。

界之灵性。朕有厚望焉，是为序。^①

大多数的道教善书都是这样假托神仙的名义而制作的。降授道教善书的神仙一般在道教神谱中的地位较高，他们是忠孝的化身神，在民众中影响较大，深受老百姓信奉和喜欢，如托太上老君之名制作的《感应篇》；托文昌帝君之名制作的《阴骘文》、《劝孝文》、《劝敬字纸文》、《戒淫文》、《救劫宝诗》、《八反歌》等；托孚佑帝君之名的《求心篇》、《功过格》、《戒淫文》、《宝训》等；托关圣帝君之名的《觉世经》、《训孝法语》、《戒世子文》；托钟离仙祖之名的《戒淫歌》等等劝善书。由这些受世人尊敬和喜欢的神来降授善书增强了道教善书的权威性和人们的认同感。

其次，道教善书宣传有神明监督人的善恶。神仙将善恶准则降给世人后，但世人是否一定循规蹈矩仍然值得怀疑。于是道教善书设置了天上、地下、家中及人体内等各级的神灵来监督和记录人的善恶行为，让神对人的行为进行防范、约束和引导。道教善书告诫世人，人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神明的监督。《感应篇》说：“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月晦之日，灶神亦然。”这里提出了三台、北斗、三尸、灶神等司过神对人间善恶的监督。三台、北斗^②在上面记录人的罪恶。在人体内还有三

① 《天律纲纪》，《藏外道书》第28册，第893页。

② 三台是北斗旁边的六颗星，它们两两相对一对称为一台。“上台虚精、中台六淳、下台曲生，”（《云笈七签》卷二五）专管人的寿夭。北斗星君是北斗星的神格化，负责人的善恶。《搜神记》说“北斗注死，南斗注生”。

尸^①，专门监督人的善恶念头。三尸神一到庚申日就上天去报告人的罪过。庚申日是天神决断人善恶的日子。守庚申原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术。因为三尸欲人早死好享祭祀之物，庚申日要上天言人罪过。所以修道的人一定要斩灭三尸，方能成道。《太清中黄真经》卷上《内养形神章第一》说“常守澹泊，三尸自灭。”修道者“常以庚申日彻夕不眠。下尸交对，斩死不还。复庚申日彻夕不眠。中尸交对，斩死不还。复庚申日彻夕不眠。上尸交对，斩死不还。一尸皆尽，司命削去死籍，著长生录上，与天人游。”^②在道教善书中，“三尸”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监督人体内善恶念头的司命。道教认为人体内还有六贼引人作恶。^③六贼即人体的五种感觉器官（眼、耳、鼻、口、身）和意念。六贼的发动会引起劫夺诸善之恶，所以被称为贼。三尸六贼在人体内作恶，人如不控制它们，就会作出种种恶业。人只有靠意志才能抑制它们。人不努力向善，就会“勾引六贼住在心，他合三尸同结连。没有一日肯安分。时刻暗盗神不全。三尸六贼能拿住，精神夺回还复原。”^④善书劝人“杀死三尸除后患，灭尽六贼断祸

① 《太清玉册》卷八说：“上尸彭倨名青姑，伐人目，居人头，令人多欲好车马；中尸彭质名白姑，伐人五脏，居人腹，令人好食轻惹怒；下尸彭矫名血姑，伐人胃命，令人好色喜杀。”“人之生也皆寄形于父母胞胎，饱味于五谷精气，是以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虫为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告天帝，以记人之造罪，分毫录奏，欲绝人生籍，减人禄命，令人速死。死后魂升于天，魄入于地，唯三尸迷走，名之曰鬼。四时八节企其祭祀，祭祀既不精，即为祸患，万病竞作，伐人性命。”（《云笈七签》卷八一。）

② 《云笈七签》卷八二。

③ 《太清元道真经》卷中说：“人不能长存者……以六贼妄生，目妄视，耳妄听，鼻妄香闻，口妄言味，身妄作役，意妄思虑。故终不归根也。”

④ 《除欲究本》，《藏外道书》第28册，第119页。